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 促进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 ——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为例

李东泉 方浩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促进新市民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体现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主要政策方向。社区作为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将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而社会资本既是社区治理取得良好成效的助推器，也是体现社会融合的检测器。文章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以成都市肖家河街道为研究对象，利用4个社区、29个院落共645份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填补了当前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研究空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资本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会融合；社会资本；成都肖家河街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章编号】**1673-0186（2019）07-0065-01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特大城市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机制与模式选择研究”（7177416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城市社区形态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9XNH023）。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内涵与实质首先是人的城镇化，核心是市民化。从城镇化的本质来说，人的城镇化体现为：一是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是新进城的居民与原来的城市居民的融合，即城市生态问题^[1]。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8%到2011年首次超过50%，2018年底已达到59.58%。快速城镇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仍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说明中国的城镇化已面临由城市生态问题带来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合挑战，原因在于，城镇化不仅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人口，也为城市带来更加多元化的人群。所以，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包括本地人与外来人、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社会融合问题。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如不尽快将市民化与社会融合目标有机植入城市治理之中，城镇将面临城镇化“陷阱”——缘于社会融合的严重障碍而生成的多重经济社会风险与危机^[2]。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其中

¹**作者简介：**李东泉（1970—），女，汉族，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方浩（1991—），男，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城市规划政策评估。

不可缺少的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3]。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动外来人口与所在城市社区、组织和居民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使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积累起本地化的社会资本，这是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大部分居民都居住在城市中的各个社区。因此，通过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最终促进社会融合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 50% 之后，城市治理开始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而大国治理需从小社区做起。可以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目标的实现，就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社会融合过程，也是新移民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

国内现有的关于社会融合文献，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较少关注外来城市人口本地化和本地农村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而且较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社区治理如何影响社会融合，现有的研究以个案和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相关的定量实证研究。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围绕社区治理如何来促进社会融合的问题，选择了近年来开展了社区治理的典型代表案例——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所辖的 4 个社区，通过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希望研究结果能为今后的社区治理实践带来有益启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促进新市民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但二者最终都要落脚于城市社区之中，如何从社区的视角来探索社会融合问题成为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研究已经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视角对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并未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阐释清楚。因此，笔者将重点讨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此建立相应的概念模型以及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设。

（一）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之间的概念模型

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政府、居委会、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动^[4]，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并形成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社区治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的运用，治理的本质就是多元主体的合作，社区治理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居民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居民彼此之间及对社区的信任感和集体意识，从而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融合。

社区治理通过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推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等方式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一种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要持续下去，就要有一种“路径依赖”，即需要培育社会成员对新制度（公民主动参与和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的社会需求，而培育社会资本就是制造这种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把社区资本培育纳入社区治理过程之中，这意味着需要推动居民间的互信和互助，加强居民间的交往，培育熟人社会^[5]。同时，林南也指出社会资本主要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它根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所共同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6]。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是促进社会融合。在中国语境下，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关关系的过程^[7]。既然社会融合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同化和相互认同的过程，而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有助于外来人口更快地适应环境，加快社会融合进程。社会融合也可以看作是外来人口的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和转化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显示，对于农民工而言，其社会融合的主要障碍是社会资本的匮乏和质量低下，因此，只有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其实不只农民工，其他新市民也同样面临在大城市中的社会融合问题。比如大城市中的本地农村人，因为城市空间扩张，他们由村民变成居民，原来熟悉的村庄被拆迁，然后集中居住在安置小区中，这些小区也被称为“过渡型社区”“新市民社区”。这些居民虽然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换和身份的转变，但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而且由于传统乡村社区

社会资本流失而现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还未形成等原因，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而且也使得这类社区治理陷入困境。综上所述，依据对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概念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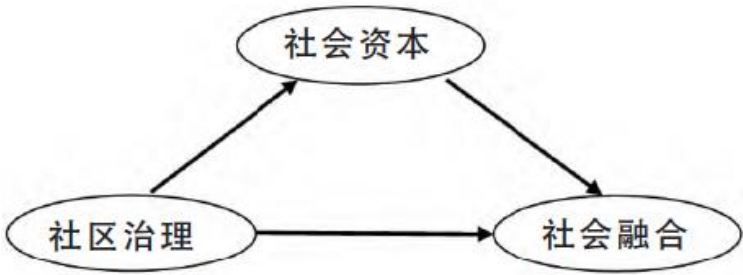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模型

（二）研究假设

现有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解释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但是对于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未梳理清楚。基于此，针对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这两个问题，提出两个关键性的假设。

1. 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

如同治理是一种过程一样，社区治理也是一种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居民通过参与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彼此的交流及合作，消除彼此的心理防备，建立信任感和集体意识，从而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社会融合。不仅如此，社区治理还改善了社区内部的绿化环境、社会治安及公共服务，这些结果都会进一步强化居民的责任感和归属意识。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社区治理效果越好，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越好

2. 社会资本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前已述及，社区治理通过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推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等方式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而社会资本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为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融合提供沟通桥梁，有利于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促进社会融合。当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不产生任何作用时，社会资本就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反之，则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由于社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都有助于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社会资本对社区融合的作用只能是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确保研究过程的规范性、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抽样选择的代表性、变量操作化的科学性、数据处理的严谨性，这些都会对实证结果的有效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3 年 6 月至 10 月对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肖家河街道的考察和调研。成都市肖家河街道成立于 1992 年，下辖 4 个社区居委会。作为成都高新区最早成立的街道办事处，最初主要用来安置当地农转非居民和旧城区拆迁居民，随着城市发展，肖家河街道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吸引大量外来居民迁入，已经成为外来人口比例大于本地户籍居民比例的街道。2009 年以来，街道办事处根据社区管理面临的挑战和自身特点，开始进行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核心内容是推行“三驾马车式”的院落自治模式，即在每个院落成立院落党支部、院落议事会和院落居民自治委员会，然后通过一系列项目和活动，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实现院落自治。为检验院落自治的成效，研究团队于 2013 年 8 月在这里开展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活动。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根据院落规模和院落性质，在 4 个社区中共选取了 26 个院落，对居民发放问卷 750 份，回收 655 份。在本研究中，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有效问卷共计 431 份。由于是以院落为单位开展的社区自治实践，下文中的变量都是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测量的，即模型中的“社区”=“院落”。

（二）变量测量及说明

社会资本是目前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奠基人是布迪厄和科尔曼，但将社会资本研究进行大规模扩展的是政治学家帕特南，在其成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就是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互惠、规范及相互信任^{[8] 150}。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笔者主要借鉴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对于社区治理的变量，笔者从治理的结果有效性方面来测量。根据调研所得，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自开展社区治理以来，主要成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区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二是居民办事的效率有极大的提高，三是居民对治理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因而最终确定环境改善、办事效率、观念转变作为测量社区治理的指标。社会融合的本质是一种相互同化和相互认同的过程，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社区认同理论主要表现在身份、文化、心理、社区四个层面上，并用李克特 5 分测量表对上述变量进行度量。

对于控制变量的测量，由于家庭收入高低直接影响外来人口是否能在本地扎根，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来人口在居住社区中的交往，家庭成员同住一地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来人口的心理融合，年纪大的外来人口在社区交往中更容易相处，男性参与文娱活动、志愿活动较少，社会融合程度较低，而在小规模居住环境中，人们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交往，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从而建立起社区信任和产生社区归属感。结合本次调研所搜集的数据，最终将控制变量确定为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家庭规模和社区规模。最后，形成表 1 相关量表的测量体系。

（三）变量处理及说明

由于代表社会融合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心理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故本文先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正交旋转使其变量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并将所得的因子得分系数作为社会融合的替代变量。本文主要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所以将因子得分系数为负的值令其为“0”，代表社会融合程度低；将因子得分系数为正的值令其为“1”，代表社会融合程度高；社区治理的各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直接用均值代替；社会资本的各变量主要源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同样以均值代替；控制变量通过设定的参考对象，将其操作化为哑变量。

表 1 相关量表的测量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问题	来源
社会资本	规范	居民知道自己对院落的责任	帕特南 ^{[8]150}
	互惠	对社区或院落有好处的事情对我也会有好处	
	信任	我最好的朋友与我住在同一个社区	
	社会交往	你是否认识院落里的其他邻居	

社区治理	环境改善	院落环境比以前好了	王素侠，朱方霞 ^[9]
	办事效率	居民生活中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快解决	张红霞 ^[10]
	观念转变	你是否认为院落自治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邓念国 ^[11]
社会融合	身份认同	我很骄傲我是这个社区的居民	卢小君，陈慧敏 ^[12]
	文化认同	大多数邻居与我的想法一致	朱冬梅，张丹，郭云梅 ^[13]
	社区认同	我的所作所为将影响社区的形象	辛自强，凌喜欢 ^[14]
	心理认同	我住在这里感到安全	褚清华，杨云彦 ^[15]
控制变量	年龄	以非老年人作为参考	汪明峰，程红等 ^[16] Elinor Ostrom ^[17]
	性别	以男性为参考	
	收入	以低于本地平均工资为参考	
	教育	以受大专以下教育为参考	
	家庭规模	以三口以下为参考	
	社区规模	以大规模社区为参考	

注：根据成都市统计局的数据，2013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58778 元，平均每月工资为 4898 元，故将平均工资大约定为 5000 元；将老年人的年龄人口界定为 55 岁以上

三、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除了注意其规范性之外，更要强调其科学性。研究的科学性依赖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依赖于研究问题的确定，本文主要探讨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检验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故对此选择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及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假设开展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二元 Logistic 中的“二元”指的是因变量为二分变量，Logistic 指对目标概率进行 Logit 变换。二元 Logistic 回归是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要求先将目标概率进行 Logit 变换，这样就保证了当概率在（0，1）取值时，Logit 转换值可以取任意实数，避免了线性模型的结构缺陷^[18]。设 Y 为二分因变量，取值为“1”代表融合发生，“0”代表融合不发生，自变量（X_i）为单因子信息量值。记融合发生的条件概率为 p，把 p 的某个函数 f（p）假设为变量的函数形式，进行 Logit 变换：

$$f(p)=ln(p/1-p) \tag{1}$$

则 Logistic 线性回归模型为：

$$ln(p/1-p)=\beta_0+\beta_1X_1+\beta_2X_2+\cdots+\beta_iX_i \tag{2}$$

公式（2）中：β₀，β₁，β₂……β_i为逻辑回归系数，将公式（2）中对 p 求解，即可以得到融合发生的概率：

$$p = \frac{1}{1 + e^{-(\beta_0 + \sum_{i=1}^n \beta_i X_i)}} \quad (3)$$

公式（3）中，p 是分布概率，其值在 0~1 之间，值越大表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X 是影响概率分布的因子， β_0 与 β_1 是对应的参数。

（二）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经过处理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表 2。从表 2 可知，社会融合程度高的样本大约占总体样本的一半；社区治理的平均得分为 4.03，说明被调研社区治理效果是比较显著的；社会资本的平均得分为 3.56，说明该区域被调研居民之间的社会资本存量较高；该区域被调研老年群体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42%；该区域被调研的女性大约占整个样本总量的一半；该区域被调研对象高于平均收入 5000 元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26%；该区域被调研对象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29%；该区域被调研对象的家庭规模为三口及以上之家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68%；该区域被调研对象所处小社区规模的样本占整个样本总量的 40%。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社会融合	431	0	1	0.47	0.50	0.249
社区治理	431	0.67	5	4.03	0.84	0.708
社会资本	431	0.50	5	3.56	0.87	0.759
年龄	431	0	1	0.42	0.50	0.245
性别	431	0	1	0.53	0.50	0.250
收入	431	0	1	0.26	0.44	0.194
教育	431	0	1	0.29	0.45	0.206
家庭规模	431	0	1	0.68	0.47	0.216
社区规模	431	0	1	0.40	0.49	0.240

（三）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将相关因变量与自变量代入软件中，最终得到表 3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经过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得到卡方值为 11.976，Sig 值为 0.152 > 0.05，表明由预测概率获得的期望频率与观测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根据表 3，笔者发现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果显著，即假设 H1：社区治理效果越好，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越好得以验证。从年龄来看，社区当中老年群体越多，越有利于丰富社区的活动，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从教育来看，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居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从社区规模来看，小规模社区中的人们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交往，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越有利于社会融合；从性别、收入、家庭规模来看，其差异程度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3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

	B	SE	Wals	df	Sig	Exp (B)
--	---	----	------	----	-----	---------

社区治理	1.496	0.186	64.910	1	0.000	4.464
年龄	0.457	0.237	3.721	1	0.054	1.580
性别	0.289	0.226	1.642	1	0.200	1.335
收入	0.118	0.265	0.197	1	0.657	1.125
教育	0.598	0.260	5.292	1	0.021	1.818
家庭规模	0.144	0.243	0.351	1	0.554	1.155
社区规模	0.451	0.231	3.813	1	0.051	1.569
常量	-7.123	0.838	72.291	1	0.000	0.001

（四）中介效应分析

所谓中介效应就是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中间加入一个中介变量。当中介变量满足下列条件时，即存在中介效应：（1）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2）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3）当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受到控制的时候，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显著降低。

为了检验假设 4，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方法，通过一系列回归方程来进行检验^[19]。由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是通过一系列多元回归方程来进行的，故笔者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心理认同的加权平均值来代表社会融合。首先，以中介变量（本文中的社会资本）为因变量，以社区治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方程①）；然后，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社区治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方程②）；最后，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同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计算（方程③）。如果方程③中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社区治理在方程③中明显小于在方程②中的作用，则说明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检验结果显示，在方程③模型中，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回归系数由 0.591 变为 0.283，这反映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2 成立。

表 4 社会资本中介效应分析

因变量	方程	标准化系数		t	sig
		社区治理 X	社区资本 Y1		
社会资本 Y1	①Y1=β 0+β 1X+μ	0.517		12.507	0.000
社会融合 Y2	②Y2=β 0+β 1X+μ	0.591		15.172	0.000
社会融合 Y2	③Y2=β 0+β 1X+β 2Y1+μ	0.283	0.596	8.015	0.000
				16.892	0.000

四、相关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到了社区治理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结论。为了实现新市民与原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

核心工作就是解决如何培育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问题。因此，通过进一步跟踪访谈调查，笔者了解到肖家河之所以能成功地培育居民社会资本，主要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采取如下措施：

（一）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手段促进社会融合

社区自治的基础是居民的公民意识，即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居民都缺乏公民意识，但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党员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应该积极调动起他们的力量。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社区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发展优秀的居民骨干、楼栋长加入党组织，并鼓励党员“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实现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同步组建，建立起“三驾马车”式院落自治模式：院落党组织、院落议事会和院落居民自治委员会。除了发挥社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们还挖掘社区能人、培养社区领袖，让更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二）以发展社会组织为力量促进社会融合

社会组织相对于居民和政府，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各种丰富多样的趣味性、公益性及维权性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一方面为社区养老、关怀弱势群体，开展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的介入，培育根植于社区内部的居民组织，培育居民自治意识，推动居民自治不断发展。例如，成都市“爱有戏”组织，为院落成立自管小组及自治组织提供项目支持、自治培训、管理培训等服务，以提升院落居民参与院落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居民当家做主的意识。

（三）以营造公共空间为载体促进社会融合

公共空间的营造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可平等进入的空间基础和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使居民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身份认同与社区认同，有助于邻里关系的重构。依托社会组织，整合社区现有的资源，利用节庆活动、公共空间的布置和文艺演出等帮助社区居民构建整体的社区文化印象。肖家河街道近年来主要引入了“爱有戏”组织和晚霞居家养老助残服务站，利用社区广场、街巷、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开展“义集、义仓、义坊”活动，举办居民艺术节、拍摄微电影、建立社区印象博物馆、兴办社区学院等，大大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增加了居民之间见面的机会，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交往，为居民的互动参与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引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社区治理通过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该研究发现不仅填补了当前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研究空白，也对未来社区治理实践带来启示，即通过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来促进社会融合，是今后社区治理应该努力的方向。

未来如何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需要进一步探索，现有的研究主要强调引入外来社会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吸引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在参与过程中培育社会资本。然而，社会组织如何组织居民参与，如何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之间如何由陌生变得熟悉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当然，本文在考虑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影响时，并未考虑到社会资本类型对社会融合的差异化影响。朱力指出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资本或黏合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更快地适应城市环境，但同时也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如果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或扎根于本地，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即建立桥梁型社会资本，以此来获得新的信息、机会和资源^[20]。除此之外，本文也忽视了社区类型对社会资本形式产生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意味着不同的居住空间，不同居住空间特征对居民的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行为具有形塑作用，因而必然对社区社

会资本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进一步围绕这些不足的地方做出更深入的探索,以期更好地实现新市民与原市民的社会融合目标。

参考文献

- [1] 周一星,陈彦光.城市与城市地理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2] 庄士成,王莉.社会融合困境与城镇化“陷阱”: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102-106+144.
- [3]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J].人口研究,2010(2):11-20.
- [4] 郭风英,陈伟东.单位社区改制进程中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 [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4-48.
- [5]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理论解释 [J].天津社会科学,2010(3):59-64.
- [6] Lin 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1): 467-487.
- [7]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J].社会学研究,2008(5):117-141+244-245.
- [8]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9] 王素侠,朱方霞.新型城镇化时期社区治理绩效的测度 [J].统计与决策,2016(21):100-102.
- [10] 张红霞.冲突与合作:多元主体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J].城市观察,2015(3):132-137.
- [11] 邓念国.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基于杭州的实证研究 [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4):89-95.
- [12] 卢小君,陈慧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与测度——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数据 [J].城市问题,2012(9):69-73.
- [13] 朱冬梅,张丹,郭云梅.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与社会适应性研究 [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70-75.
- [14] 辛自强,凌喜欢.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概念、测量及相关因素 [J].心理研究,2015(5):64-72.
- [15] 褚清华,杨云彦.农民工社会融合再认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人口与发展,2014(4):28-36.
- [16] 汪明峰,程红,宁越敏.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J].地理学报,2015(8):1243-1255.
- [17] Ostrom E.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7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sues, 2010(1):1-22.
- [18] 杜谦,范文,李凯,杨德宏,吕佼佼.二元 Logistic 回归和信息量模型在地质灾害分区中的应用 [J].灾害学,2017

(2): 220-226.

[19]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 心理学报, 2004 (5): 614-620.

[20]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J]. 江海学刊, 2002 (6): 82-88+206.